

民族研究工作的跃进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編輯

科学出版社

关于这五篇报告的选辑，需要作一些简单的说明。过去两年中各调查组所编写的调查报告，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有很多宝贵的资料。我们这一次之所以选辑这五篇报告，是因为它们比较显著地说明了这些民族在解放前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的游猎生活和云南西盟卡瓦族的刀耕火种基本上保存了不同阶段的原始社会生产方式；凉山彝族的社会可以为奴隶社会的研究提供许多现实生动的例证；而新疆夏合勒克乡维吾尔族的庄园制和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傣族的领主制更是封建社会不同形态的典型代表。解放后，这些民族从他们原来所处的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出发，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已经或者正在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短短的时期内，他们已经摆脱了落后状态，进入文明幸福的新的历史时代，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之中。因此，我们选辑这五篇报告，一方面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资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阐明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与伟大和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还应该说明的是，将近九年来特别是最近这一年全民大跃进以来，我国五十个少数民族的社会面貌已经焕然一新。这本书里所涉及的五个少数民族同样处在飞跃进步中。关于这五个少数民族及其他几十个少数民族新的历史情况，我们在明年出版的民族简史、简志丛书中，就会有比较全面的阐述。

（这五篇报告都还只是初步的、资料性的，希望读者多提意见，以便进一步开展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我们谨以这个集子作为一九五八年国庆节的献礼！

总 目

編者的話	(i)
民族研究工作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問題	汪 鋒 (1)
两年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工作的基本总结	謝扶民 (8)
研究少数民族历史也要贯彻“厚今薄古”	潘梓年 (25)
民族研究工作的跃进规划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30)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报告选輯

使用馴鹿的鄂温克人的社会形态	內蒙調查組 (39)
云南西盟卡瓦族的社会經济情况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一些問題	云南調查組 (101)
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民主改革以前的社会面貌	四川調查組 (175)
新疆維吾尔族夏合勒克乡民主改革以前的封建庄园經济	新疆調查組 (217)
西双版纳景洪傣族民主改革以前的領主經济	云南調查組 (251)

插 图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大会留影
中国境内使用馴鹿的鄂温克人分布图,照片
云南卡瓦地区图,照片
凉山彝族地区图,照片
新疆夏合勒克乡位置图,照片
西双版纳地区图,照片

民族研究工作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問題

汪 鋒

編者按：这篇文章是根据汪鋒同志 1958 年 6 月 23 日在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的講話整理的。汪鋒同志的这篇講話，指出了民族研究工作的方向，对于今后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今天正式成立了。让我首先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民族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的民族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将把党内外从事民族研究工作的力量进一步地组织在一起，更有计划，更有系统地开展民族研究工作。这不仅是我国科学研究工作方面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我国民族工作方面的一件大事。因而，它特别值得我们高兴和庆祝。许多问题潘梓年同志已经讲到了，我很同意他的意见。我对于民族科学研究是一个外行，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一谈民族研究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我个人的意见，只是提出来作参考，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大家都知道，我们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研究民族问题，早在党的创始时期就开始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成立了民族研究机构，民族研究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解放以后，同全国其他方面的工作一样，民族研究工作也有了巨大的进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座的许多同志都是这个工作的参加者，特别是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同志们，对这一方面的情况知道得很清楚，体会也更深刻，因此这方面的问题我就不再细谈了。有的同志认为过去几年在民族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我们今后民族研究工作

的迅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看这个估计是公平的、正确的。民族研究工作的成绩是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但在另一方面也还存在许多问题,值得我们研究解决。通过几年来的工作,特别是从这次科学讨论会揭发出来的问题来看,除了工作上的一般缺点和错误外,我感到严重的是一些从事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工作的人员,特别是其中的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仍然严重地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问题。这在同志们的大字报里边反映得非常清楚,揭发的问题也比较惊人,在个别人的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正是由于有两条道路的斗争,有两种思想、两种人生观,因此,在民族研究问题上就有许多问题还值得进一步讨论和研究。必须要统一对民族工作、对民族研究工作的正确认识。在民族研究工作中,就象这次科学讨论会上同志们指出来的,有不少的人在民族研究工作中的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还较为普遍。这种错误倾向的根源是和一部分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的错误思想分不开的。这些都严重地妨害了民族研究工作更进一步的开展,如果不及早克服,就会带来更多的损失。

什么是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呢?不及时地加以克服会有什么结果呢?许多同志的大字报都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同志们说得很对,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不彻底,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研究结果,也绝不会提供出有科学价值的和符合四千万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利益的作品来。

1. 我所说的脱离政治,首先就是脱离党的领导。这一点很重要。许多作调查研究工作的同志离开了党的领导,不尊重地方党委的意见,不愿意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做工作,不愿意与地方党委联系,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等等。这些同志在嘴巴上虽然也在说“要跟共产党走”,但是实际上他没有这样作。试问离开了党的领导,跟党走还有什么内容呢?同志们可以回忆一下,从解放以前的爱国反帝,到解放以后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至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的整风,无论那一个运动、那

一項工作不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和取得勝利的呢？一個人如果脫離了黨的領導，還能不能夠正確地跟着共產黨走呢？肯定的說，是決不可能的。在民族研究工作方面，許多同志辛辛苦苦地進行了工作，如果說他們完全沒有跟着黨走那是有點冤枉的，但是至少在這一方面的認識還有不夠的地方。脫離政治的另一種表現是離開了黨的民族政策。如果離開黨的民族政策，還怎能設想做好民族研究呢？脫離政治的再一種表現是離開了黨的政治運動。毛主席常說，我們是不斷革命論者，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這樣來提高我們的思想，提高我們的認識。可見，如果離開了各種政治運動，思想認識就不可能提高，而民族研究工作也就一定不會做好。

2. 脫離羣眾：同志們都知道“到羣眾中去，向羣眾學習”這個響亮的口號。但是在我們的民族研究工作中卻存在着脫離羣眾的現象。許多同志不向羣眾學習，關着門坐在屋子裡研究問題，不願意依靠羣眾，不懂得羣眾有無窮無盡的智慧，總覺得羣眾不如自己有知識，不如自己有學問。因而不相信羣眾，遇事不跟羣眾商量，甚至不願意到廣大羣眾中去調查。由於不相信羣眾，因而对羣眾提出來的問題就不能加以分析和提高，也不能做到和羣眾同吃同住同勞動，與羣眾打成一片。羣眾自然也不會把我們看成自己人，不會相信我們是替他辦事的。試想，如果離開了少數民族羣眾的支持，還怎能設想做好民族問題的調查研究呢？

3. 脫離實際：脫離實際的主要表現是用主觀主義的方法，用個人腦子想出來的問題硬在調查中去加以証實，而不是從實際出發去調查實際情況。正如同志們所揭發的，如有的人不向廣大勞動人民調查專找少數被打倒的地主階級去調查，有的人不去調查階級關係經濟情況，而專去調查那些無關緊要的奇風異俗，甚至專門調查一些下流的低級趣味的男女關係。總之，不是以馬列主義的觀點去作調查，而是用一種資產階級的非常庸俗的觀點去調查和研究問題。民族研究工作怎样才能不脫離實際？進行調查研究是向廣大的少數民族勞動人民調查還是向少數的上層人士調查？調查什麼？怎麼調查？這是立場問題，是給什麼階級服務，是破什麼，立什麼的根本問題，絕

不是調查方法問題，這些問題都是今後工作極需解決的問題。在民族研究所成立的時候，同志們提出了這些問題，並且積極地研究解決這些問題，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應該解決的關鍵性的問題。

政治掛帥。任何工作脫離政治都是不可能作好的，學術研究沒有政治，當然也是作不好的。出席會議的同志對於脫離政治的情況曾作了認真的檢查批判，這個方向是正確的方向。經過這次會議對每個人來說都會提高一步。會上許多同志對民族主義思想，對舊的資產階級民族學的思想，舊的資產階級的調查研究方法等等都進行了比較徹底的揭發和批判，有這些錯誤思想的不少同志都作了認真的檢查，表示要“大破大立”，“拔白旗，插紅旗”，“插社會主義紅旗”，這些作法都是正確的、必要的。因為許多問題孤立地看起來是一根頭髮，抓在一塊兒就是一把頭髮。許多觀點、許多思想方法結合起來就會構成一條路線，就會構成一條民族研究工作上的路線。因此必須對這些錯誤的觀點思想方法加以認真的批判。

當然，我們所說的民族工作中的兩條路線、兩種方法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的問題。基本問題、關鍵問題是立場問題。凡是站在剝削階級立場，經常為剝削階級着想的人，就不可能是一個真正的革命戰士；一個民族主義者，無論是大漢族主義，或者是地方民族主義者，也絕不可能代表任何民族的利益，沒有一個政治工作者（當然民族工作者也在內）能夠脫離階級，而不為階級服務的，不是無產階級，便是資產階級或者其他的剝削階級，超階級的思想意識是不存在的。要無產階級立場堅定，就必須有明確的高度的嗅覺，辨明大是大非，辨明正確與非正確，辨明香與臭。立場問題毛主席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中指出了六條，每一個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都應當堅持並特別注意學習力求達到這些標準。這六條的第一條是：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民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這對於作民族工作的同志特別重要，必須很好學習和體會。在民族研究工作中要克服“三脫”現象，這六條對我們也有現實的指導意義。從個人來講，在自己的頭腦中應該經常認真地批判個人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因為無論個人主義和民族主義都有其歷史根源，有其長期性複雜性，不可能在一個

会上一次批判就解决所有的問題。

党对于干部的要求是紅透专深,不是只紅不专,也不是只专不紅。要紅透要专深,这些問題就应该彻底搞清楚。这是我們每一个干部努力的方向。紅透专深的奋斗目标对民族研究工作者來說也不能例外。必須使我們成为民族工作的专家。必須鼓足干劲力爭把民族工作作好。每一个民族研究工作者都应该有堅定的无产階級立場,密切和羣众联系,时刻的接受党的領導,这样才不致于犯錯誤或者說少犯些錯誤。

研究民族問題,首先,应该有利于解决民族团結統一問題。我国各民族經过了改革、改造和整风反右等种种斗争,民族团結是更加巩固了,但是,也不能否認,一些民族的长期的历史隔閡还没有完全消灭,而一部分民族内部的隔閡也还没有最后清除。研究民族問題的目的就在于解决这些民族隔閡,加强民族团結,并且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从而解决各民族間存在的在經濟上文化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問題。民族問題的研究必須与民族工作密切地結合起来,研究的目的要有利于民族团結,有利于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无论研究历史和現况都应该从广大的劳动人民着眼。民族研究所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成立的,它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服务,为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服务。毫无疑问,这是个很光荣的任务。因此在研究的方法方面,必須与少数民族人民打成一片,彻底克服不相信羣众的观点。我們要求每一个民族工作者都要下定决心改造自己。要求每个人都必須破个人主义,立集体主义。在民族工作方面,研究民族問題的人往往容易认为这是一个独行,別人沒有发言权,只有自己是专家。例如,少数民族語言所虽然成立不久就已經发生了这样的問題,有的人为少数民族創造了文字,就想把持一方,只有自己是权威人士,別人都不能插手。民族研究所成立以后也要特別注意这些問題。权威思想,个人名利思想,鋤冷門的思想,“小倉庫”思想,把持材料不拿出来供給大家看以及不安心工作等等,这都是个人打算,都应该在工作中認真地并且經常地和这些思想作斗争,要彻底检查和批判,要坚决地树立集体主义。上面已經談过,个人主

又有它的階級和歷史的根源，因而要徹底克服就需要作艱苦的努力。對個人主義必須採取堅決批判和克服的態度，絕不能讓它發展。有個人主義思想毛病的人，都應當認真地對待同志的意見，絕不應該採取敷衍的態度，原諒自己的錯誤。個人主義不克服，總要暴露，只要土壤、氣候適合它就冒出來了，所以必須認真批判個人主義。還要求每一個民族工作者必須破民族主義，立社會主義。漢族要破大漢族主義，少數民族要破地方民族主義。只有破了民族主義才能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立場，是維護祖國統一和各民族團結的，民族主義的立場則是損害和分裂祖國的統一，破壞民族團結的；在對黨所抱的態度方面，社會主義者的立場是擁護黨的領導的，民族主義者的立場則是反對黨的領導的；這是兩個對抗的矛盾，也是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最根本的分歧。民族研究工作必須經常地檢查自己，是站在社會主義立場上，還是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如果我們對少數民族的某些落後現象加以歪曲，加以誇大，甚至對少數民族人民加以歧視，加以侮辱，這當然是錯誤的，是大漢族主義；另一方面，如果不承認少數民族的經濟地位上還有某些落後的地方，不願意進步，不願意接受進步，固步自封，把一些落後的事實描寫成為革命的進步的，甚至故意抹煞民族內部的階級矛盾，這當然也是錯誤的，是地方民族主義。在這一方面必須經常警惕，保持清醒的頭腦，任何為反動統治者作辯護的作法，都是同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東西，任何為地主階級、封建剝削者作辯護的人都不是真正的革命者。

對於少數民族歷史的研究，特別要採取正確的观点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應該說，過去的歷史和歷史材料，有真有假，半真半假，甚至是全假的。因此，有些歷史材料的翻案是難免的，對於這些材料都要大膽而認真地加以分析和研究。不適合民族發展，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都應當加以批判。要全面地看問題，不能片面地看問題。例如對於歷史上的少數民族起義和叛亂問題，把起義說成起義是對的，把叛亂也說成起義就是不對的；把少數民族統治階級掀起的反對別的民族的事件說成起義，就不合乎事實，也不合乎歷史發展規律。必須懂得，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国家，長期以來，我國各民族人民即用

辛勤的劳动,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土,创造了祖国的历史和文化。无论那个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一个组成部分。各民族人民的亲密团结,互助合作,是构成我国历史的主要的一方面。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仇杀事件,必须要记在各民族统治阶级的账上。不应该把历史上所有汉人对少数民族的历次用兵不加分析的统统都说成是反动的。不能这样。应该加以分析,它有反动的一面就是一面,反动的两面就是两面,反动的三面就是三面,剩下还有一面不是,那也应该肯定它不是。这些问题都还可以争辩。许多在民族研究上存在的问题,都应该分析来看。任何革命如果他杀了异民族的劳动人民,就是反动的,如果他杀了异民族的反动统治阶级,因为是反动统治阶级,是剥削阶级,那不算坏事,不应把观念混淆起来。如果历史上的许多问题搞得不清楚,那么我们的民族问题,将来就没有法子来研究。在这个民族来说是英雄,在那个民族来说是侵略者,应该客观地看待研究这些问题。民族研究所将来会遇到和发生这些问题,要慎重一些,下结论不妨慢一些。民族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不可能说不犯任何错误,我们准备犯错误,但是我们的态度是认真的,真正为研究,用正确思想方法研究,发生错误是难免的。如果别人对了,我们错了,可以改过来,接受正确的意见。也不要怕犯错误,怕的话什么东西都不敢研究了。要有创造精神,要破除迷信,要解放思想。要作好工作认真的研究。应该组织一批力量,特别要注意在青年中培养一批又红又专的民族研究干部。

最后,科学讨论会上提出一年内完成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编写三套丛书的计划,我认为这个计划是很好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同志们的干劲是十足的,是完全符合总路线的,我们给五十个少数民族写简史、简志,写民族自治地方概况,这是给四千万少数民族人民办好事实。搞好了,不仅是受到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的拥护和赞成,而且在国际上也有良好的影响;搞不好,也会遗臭万年。是流芳百世呢还是遗臭万年?应该是流芳百世。这是一件大事,跃进计划很好,这是光荣的政治任务,时间虽然紧迫,但在党的总路线光辉照耀下,在中央和地方党的领导下,加上同志们的努力,任务是可以完成的。祝同志们健康!

两年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 調查工作的基本总结

謝扶民

編者按：这篇文章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付主任委員謝扶民同志在民族研究工作科学討論会上的講話稿，特征得人民大委同意，在此发表。

这次民族研究工作科学討論会开得很好，解决了很多重大的問題，特别是在民族研究工作两条道路的斗争上和制定民族研究工作跃进规划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无疑的，这次会议是少数民族研究工作大跃进的会议，是拔资产阶级的白旗、立无产阶级的红旗的会议。现在，我就两年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調查研究工作中的問題，发表一点意見。我要談的問題是：一、两年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工作的成績；二、肃清资产阶级民族学、社会学对調查工作的影响；三、在民族調查工作中要政治掛帅。

一、两年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工作的成績

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調查研究工作，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在1956年初，在彭真同志的亲自指导下組織了八个調查組进行調查。两年来的調查工作，充分証明这项工作对于民族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有很重要的意义。两年来調查工作的成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为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材料

两年来我們調查了 20 个民族的社会基本情况,調查的材料共有一千五百万字,已付印的材料在四百万字以上。由于我們比較系統地深入地調查了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对当地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提供了有益的材料。我們所調查的社会生产力的情况,直接有助于当地党委研究怎样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以及改造不利于生产的种种条件。生产关系的調查材料,有助于当地党委进一步系統地了解当地民族的社会經濟結構和階級关系,对研究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問題是有幫助的。上层建筑和其他社会現象的調查材料,对在社会主义大跃进中如何改造少数民族原有的政治制度、家族制度、意識形态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落后因素,也提供了某些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例如,云南調查組所調查的卡瓦、景頗等民族的材料,对这几个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进行了比較全面的調查和研究,特别是对社会經濟結構和階級分化的情况、对合作化和生产大跃进中部分山官头人的抵触和反抗,以及对妨碍生产的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如原始的共耕习惯、不善于組織与計劃生产、分配上的原始平均主义等等),都作了比較細致的調查和研究。无疑的,这对当地党委研究当前社会主义大跃进中的問題是有参考价值的。此外,藏族、彝族地区的調查,对研究民主改革也是有用处的。其他十多个民族的調查材料,同样地証明:对全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进行全面的系統的調查研究,对民族工作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这项工作民族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二) 为科学研究收集了丰富的資料

我們所調查的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是各种各样的。有保留原始公社殘余較多的,有奴隶制因素較显著的以及封建制的等等,这对研究人类社会原始公社以来的历史提供了許多有价值的資料。

例如，独龙族的調查材料，对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个民族到解放前为止，尚未越过鉄器、木器、石器并用的时代。他們主要的农具除刀、斧以外，小木鋤也是他們主要农具之一，还不会使用耕牛。耕地絕大部分是輪歇，只有极少部分固定。土地除了宅旁的园地以外，絕大部分是夥有夥种，就是几戶人家共同占有一块土地，共出籽种，共同劳动，收获物按戶或按籽种量平均分配。但是，目前这种夥有共耕地已逐漸集中到家长或头人手中，并且有了稳定的占有权。因此，这种伙有共耕制是由土地公有向私有制轉化的过渡形态。独龙族内部私有制虽有萌芽，貧富已有分化，但尚未形成对立的階級剝削关系。在这种社会里，侵犯私有权的事例几乎没有，因而也没有产生保护私有权的习惯法。独龙族社会今天还保留有三、四代同居的家族公社。一个公社分为若干半独立的小家庭，每个小家庭内有火塘与倉庫，輪流煮飯，吃大鍋飯，并由年长的妇女分配食物。在婚姻制度方面，实行严格的族外婚，并保持某些对偶婚的残余。由于父权制的发展，也盛行一夫多妻。

除独龙族外，鄂倫春族也还保留有原始残余較多的社会經濟形态，它提供了研究原始游猎民族的一种很好的典型。此外，黎、怒、傈僳、景頗、卡瓦等民族的調查材料，为我們研究原始社会如何过渡到階級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資料。当然，这些資料还只是初步調查的結果，还需要繼續深入研究。

彝族的調查，在科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究竟彝族社会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者是处于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过渡时期，已經引起了爭論。对这个問題作出結論还为时过早。

在解放前虽然同样处于封建社会的僮族、苗族、布依族、維吾尔族、蒙古族，以及现在还处于封建社会的西藏藏族等等，它們的发展水平却不完全一样，經濟結構、階級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和其他社会現象，根据調查的材料来看，各有某些特点。对这些民族发展的特点进行調查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我們对各民族的社会情况进行了系統地深入地調查之后，才便于进一步追溯各民族的历史，为研究民族的发展史打下了基础。各

民族的实际情况，是各民族历史上发展下来的，并且有許多历史遗留的痕迹。譬如凉山彝族社会有奴隶制的情况，有封建制的情况，也有某些原始社会的痕迹。只有对現存的这些情况全面了解之后，才便于进一步从大量历史文献中去追溯彝族的发展史。肯定的說，不对现实的情况进行調查研究，只想靠历史文献或古希腊、羅馬的历史去推断彝族的历史，是不行的。相反地，照我們現在的作法，即对现实情况調查之后，再去研究历史，才是正确的研究方法。

我們所調查的材料已引起了社会科学界广泛的注意。过去我們所付印的各民族的調查材料，每种材料都印了五六百份，发給一百多个有关单位，無論历史学界、哲学界、教育部門、民族工作部門，都对我們的調查材料感到极大的兴趣。某些科学研究部門把我們調查的材料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史、东方民族发展史的重要参考資料。这不是沒有原因的。因为从我們的調查材料中，可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一般規律，同时也可以研究各民族发展的特点，可以研究一般規律中的某些特殊問題。

（三）为民族調查工作培养了干部，积累了經驗

在过去两年的工作中，培养了干部，积累了經驗，为今后的調查研究工作的大跃进打下了基础。

培养了干部，主要是指参加調查組的干部，在实际調查工作中，在整风反右派的斗争中，在反对資產階級民族学、社会学的斗争中，都得到了鍛炼和提高。只举三点就可以証明：（1）費孝通、黃現璠、吳泽霖、林里夫等右派分子的反动理論再也沒有市場了；（2）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唯心主义等等，受到了比較彻底的批判；（3）資產階級民族学、社会学已經被搞臭了。如果說过去有很多同志不知道資產階級民族学、社会学是什么东西，因而对資產階級专家还有迷信，現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都足以說明我們的政治觉悟、理論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干部受到了鍛炼。

积累的經驗應該說是很丰富的。我們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的經驗，反对資產階級民族学、社会学的經驗，以及調查工作方法的許多

經驗，如：點面結合、調查與研究相結合、調查工作與當地中心工作相結合、調查組的任務與組員的專業專長相結合、現狀調查與歷史追溯相結合等等方面的經驗。如果說我們過去開始調查時還要先作幾個月的試點工作，以後就不需要這樣作了。如果說許多同志過去沒有到過民族地區，對少數民族社會調查是生手，現在就是老手了。

特別是領導上也積累了不少經驗。大家知道，從四面八方組織這樣龐大的隊伍從事全國性的調查，是很複雜的組織工作和思想領導工作。開始時沒有多少經驗，現在情況也大不相同了。

對我們的成績表示懷疑的同志，說我們的隊伍中出了許多右派分子，資產階級民族學者社會學者也不少，調查隊伍太龐大，人員思想情況太複雜，因此他們說我們的工作“一團糟”。

我們應該怎樣認識這個問題呢？

首先，在全國當時處於右派分子向我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的時候，我們調查組也不可能例外。給了右派分子大鳴大放的機會，使毒草生長出來再鋤掉它們，這是一件好事，也正如全國的反右派鬥爭的勝利一樣，我們在八個調查組內揪出了二十多個右派分子，是一個勝利。

其次，資產階級民族學者和社會學者參加調查組的工作，這只能更便於我們在实际工作中揭發他們的反動的立場和觀點，鍛煉了我們幹部的識別能力。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是在实际工作中，是在與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更加豐富的。不可設想，離開了實踐，在屋子裡與他們進行空洞的“理論”鬥爭。這樣看來，他們當了我們的反面教員，教會了我們識破他們的真面目。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感謝他們。同時，經過实际調查和兩條路綫的鬥爭，不但提高了大家，而且對一般的資產階級民族學者和社會學者也進行了思想改造，對於他們也是極為有益的。

當然，我們的工作還有某些缺點。在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上，在經費開支上都發生過一些問題。但必須肯定我們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我們所取得的成績，首先歸功於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領導，歸功於彭真同志的經常不斷的關懷與支持。同時與參加調

查工作的同志們辛勤劳动也是分不开的。

二、肃清資產階級民族学、社会学 对調查工作的影响

調查工作的成績是显著的。取得这样大的成績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我們經常不断地批判了資產階級民族学、社会学的反动观点；与資產階級民族学、社会学作斗争，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工作中两条道路斗争的中心环节，是关系調查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

資產階級民族学、社会学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学派，但是它們的本質都是为階級压迫和民族压迫服务的。資產階級的民族学者和社会学者故意宣传“階級和平”，掩盖階級矛盾和階級斗争，反对階級斗争和无产階級革命。他們宣揚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說民族有“优”“劣”之分，“优等”民族應該統治“劣等”民族。同时它們也宣揚民族孤立主义，頌揚民族的一切旧制度，为少数民族的統治階級服务。解放前，中国的民族学者和社会学者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調查，无非是污蔑少数民族是“野蛮的”“不文明的”民族，为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和国民党的民族压迫制度制造“理論”根据，收集情报資料。他們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国民党的爪牙。

解放后，許多資產階級民族学者和社会学者，并没有改变他們的反动本質，仅仅是用馬列主义的詞句掩盖他們的反动立場和观点。他們虽然不敢公开主张階級压迫和民族压迫，暗地里仍然贩卖資產階級的反动貨色。特别是费孝通等右派分子，披着“学者”的外衣，怀着极其反动的政治目的，企图篡夺整个調查工作的領導权，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工作为陣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他以資產階級民族学、社会学的反动理論，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如他对在解放前已經基本上处在封建社会初期的景頗族社会，認為“階級分化不明显”，并且提出景頗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关键問題是提高文化的問題，企图否定从經濟結構和階級关系上改变少数民族的根本面貌，即是反对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他以資產階級功能学派的反动观点来反对社会主义。

不仅如此，他还主张将独龙族保留一部分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好当作原始社会的“标本”。这显然更是极其反动的政治主张。右派分子吳泽霖在苗族地区調查时，也提出苗族“阶级分化不明显”，“阶级斗争不尖锐”的反动言论，与我们党在该地区的土地改革方针相对抗。他处心积虑地在調查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之后，提出对落后的不利于生产发展的风俗习惯也不能进行改革的反动主张，說：“为了保护民族特点，就是一次杀几百头牛（指“吃牯𪗇”），也在所不惜”。这一切都充分說明他們原封不动地以资产阶级的的一套民族学、社会学来反对社会主义。

除費孝通等右派分子外，岑家梧、李有义、楊堃、楊成志等教授，在調查中也暴露了资产阶级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反动观点和調查方法。他們的反动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不从經濟基础来認識社会本質， 抹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在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經濟結構即社会經濟制度是社会存在的现实基础，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条件。上层建筑与經濟基础虽然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但是上层建筑是在經濟基础上产生的，是为基础服务的，归根結蒂是經濟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馬克思列宁主义者首先着重从社会經濟結構和阶级关系来認識社会，改造社会。党所規定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的方针是：“首先調查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力，社会所有制和阶级情况，然后尽可能收集历史发展資料和特殊的风俗习惯，进而对各民族历史作系統的研究。”这个規定是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的。

资产阶级的民族学者和社会学者违反了這個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岑家梧教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海南島調查黎族合亩制时，只注意調查氏族制度、婚姻制度以及其他上层建筑方面的材料，而不注意調查經濟基础，就主观認為合亩制的社会性質是“父系大家族”，“上限不到母系社会，下限不到阶级社会”。实际上早在解放前——游击战争时期，合亩制地区就已实行土改反霸，在合作化和生